

戴元光 主编

中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 2014 蓝皮书

新闻理论研究

传播学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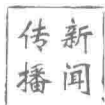
媒介经营与管理研究

广播电视研究

新媒体与社会发展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戴元光 主编

中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 蓝皮书

／ (2014)

主笔 郝雨 孙黎 孙健 陶文静 於红梅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内容提要

本书是对我国 2014 年新闻与传播学学术界研究状况进行综述的学术参考书。本辑依然从新闻理论研究、传播理论研究、媒介经营与管理研究、广播电视研究、新媒体与社会发展研究五个板块对当年的整体研究情况进行了论述,可作为新闻与传播学研究人员的研究参考用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蓝皮书. 2014/戴元光主编.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

ISBN 978-7-313-14080-7

I. ①中… II. ①戴… III. ①新闻学—传播学—研究—中国—2014

IV. ①G21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66178 号

中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蓝皮书(2014)

主 编:戴元光

出版发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200030

出 版 人:韩建民

印 制: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字 数:240千字

版 次:2015年11月第1版

书 号:ISBN 978-7-313-14080-7/G

定 价:50.00元

地 址:上海市番禺路951号

电 话:021-64071208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张:11.25

印 次: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025-83657309

比起 2013 年,我认为 2014 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更有实绩。

新闻理论研究取得较为显著的成绩,尤其是关于提升新闻理论的理论性方面提出新的路径分析,虽然新闻学术研究仍然处在弱化的趋势;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研究在经历了几十年后,学界仍然关注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研究及中国化,过去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研究的学者仍是今天的主力,但未见新的力作,泛泛而谈居多;媒介融合研究是今年新闻理论研究最有亮的部分。总体上讲,新闻理论研究没有大的突破。

2014 年是传播学研究收获较多的一年。正如本书所说的:“2014 年传播学研究是在一种总体上更为自觉地危机与挑战、反思与重建的意识中展开的。”因此,关于反思与重建是成果最多的,《新闻记者》充当了主阵地。学者们意识到传播学研究反思性重建的目标,不是努力推动反思和对缺失的修补,而是要重建传播学。这样的反思反映出对新媒体时代传播学者对现存传播学理论失去信心,也反映出传播学身份认同的危机。有对传统传播学理论的检讨,有提出传播学理论研究两条路径(孙玮),有提出传播学理论研究的三个方面(陈卫星),有提出整体转移(黄旦)。其实传播学理论或范式创新一直被提出,传播学理论与范式也一直在创新。从传播学理论发展史看,传播学理论发展与传媒技术发展有逻辑关系,纸质媒体时代,学者们提出了“魔弹论”,电子传媒时代,学者们提出了“有限效果论”,现在进入融合媒体时代,学者们提出了数字化生存。从研究视角看,纸质媒体和电子媒体时代,高度关注传播的社会效果,与竞选、商业利益密切相关,目标主要是规范社会行为。互联网时代,虽然媒体仍然是受资本逻辑控制,但至少更人性化,主流社会发生控制危机。严格讲,融合媒体时代的传播学研究还在建构,已知的问题还不多。我还认为,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显得过于庞大,更多的显示出是一个平台,至少是一个跨界的学科,亦或跨界的平台。

媒介经营与管理研究发生较大变化,由于媒体的发展,传媒研究的外延不断扩大,传媒发展趋势研究是热门话题,首先是对产业规模的关注,其次是对产业结构变化的关注,而互联网时代与逻辑下,传媒产业的发展方向成为研究重点。应该说,文化产业一直被关注,关于文化制度的研究、文化产业发展趋势的研究、文化产业园的研究是中心议题。

广播电视研究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①研究体系与学科建构,学术脉络梳理和核心概念更新是年度广电研究中的最突出亮点。全国性的权威调查报告与学术会议已普遍达成重整新传播时代的广电研究这一共识。广电相关媒介形态的描述、定义与概念化将“视听媒介”、

“用户”等概念涌入广电研究领域的核心位置。广电思想史、媒介史的研究为学科整体研究范式转换提供了理论和经验资源。新受众/用户研究中概念操作化与研究方法的演进进一步推进了学科整体性的提升。②广电制度层面研究曾在2007~2010年间产生井喷式进展,但在随后跨学科的研究者逐渐减少。2014年,此领域研究主要围绕产业探索和行业规制展开。其间反映出处于剧烈变迁的广电组织与其他社会部门之间的关系重构和从“大公共性”视角对广电业的规范引导。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许多学者对相关制度的历时性研究越来越贴近中国当代的经验环境,传媒产业规制的学术图谱研究层次也从应用层面转向政治经济学派脉络的理性反思,传媒产业规制的学术图谱也使该领域研究呈现出更系统化的演进。③文化层面的广电相关研究包括文化交流中的视听现象与文化研究脉络中的视听传播两个主要部分。城市传播范式下,影像作为一种中介化的传播媒介,既是认识论意义上的方法与工具,也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方式。城市传播中的视听传播研究是年度研究中将广电/视听研究与基础传播学理论进行的勾连的代表之作。④操作层面研究主要包括视听语言与电视新闻实践研究、从业者研究、电视节目研究等三个部分,其中视听叙事学的学科体系建构为视听传播机制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精确报道与数字新闻研究则是学界与业界的双重突破,节目模式研究也因其中的历史视角和概念反思而呈现向深度的迈进。

微博、微信和移动传播,以及“新社交工具时期(APP)”的媒介,是这一年新媒体研究特别青睐的“新星”。有研究者梳理了近十年来我国互联网传播领域由博客、微博和微信所引发的三次重大变革,并认为它们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传播的模式和方法,并将塑造以个人为中心的全新互联网面貌。新媒体研究中的这些“新星”,凸显了新媒体发展的现状:它是国家发展的战略重点,并已成为经验研究关注的重点。2014年的研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国家基础设施(尤其是安全、隐私)的建设、新闻业的重构、新受众的了解、网络群体、国家治理和公众表达这几个亮点。

主编

目 录

新闻理论研究发生结构性变化

——2014 年我国新闻理论研究

一、新闻理论建设研究	(1)
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	(4)
三、新闻工作者职业素养与使命研究	(6)
四、新闻伦理研究	(7)
五、媒介融合新闻研究	(9)
六、新闻专业主义	(12)
七、新闻制度、法律、法规研究	(16)
八、媒体监督研究	(18)
九、新闻思想史研究	(18)
十、舆论研究	(19)
十一、其他相关理论问题研究	(24)

更为自觉的危机与挑战、反思与重建的意识

——2014 年中国传播学研究

一、学术史回顾的视角与进路	(28)
二、反思与重建	(29)
三、传播史/传播学术史研究	(36)
四、跨文化传播研究	(39)
五、城市与空间传播研究	(44)
六、媒介与集体记忆研究	(47)
七、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	(50)
八、新媒介与媒介化/中介化	(51)
九、向传播研究大师致敬	(55)
十、简要的评析	(59)

外延扩大价值多元的传媒经营与管理研究

——2014 年中国媒介经营与管理研究

一、传媒产业发展趋势研究	(63)
(一) 报业向何处去	(65)
(二) 广播电视产业	(67)
(三) 新媒体产业	(69)
(四) 出版产业	(71)
二、新闻传播体制、规制研究	(73)
(一) 传媒管理体制	(73)
(二) 传播法制	(75)
(三) 网络侵权	(77)
三、文化产业研究	(78)
(一) 文化产业制度研究	(79)
(二) 文化产业发展趋势研究	(80)
(三) 文化产业园研究	(82)
四、广告经营管理研究	(83)
(一) 广告产业	(83)
(二) 广告法律法规	(86)

重整与迈进

——2014 年中国广播电视研究

一、理论篇:研究体系与学科建构	(89)
(一) 媒介融合与学科反思	(89)
(二) 媒介形态变迁与概念重塑	(91)
(三) 研究体系重构	(99)
二、制度篇:产业运作与社会规制	(104)
(一) 广电媒介组织管理运作与产业经营	(104)
(二) 广电社会功能研究	(109)
(三) 融合时代下的媒介规制	(111)
三、文化篇:文化交流中的视听传播与关系重构	(116)
(一) 跨文化传播中的影响力与竞争力	(116)
(二) 广电媒介使用与民族研究	(118)
(三) 影像作为一种城市传播方式	(120)
四、操作篇:业务更新与模式演进	(121)

(一) 新广电时代的业务研究	(121)
(二) 节目研究向深度迈进	(124)
五、结语:重整与迈进——广电研究的新时代	(126)
(一) 广电相关研究的进展与突破	(126)
(二) 研究不足与今后讨论的方向	(127)

根植在特定的历史和文化场景当中

——2014 年度中国新媒体与社会发展研究

一、微博、微信、移动传播:新媒体研究中的“新星”	(130)
二、移动互联网研究:国家基础设施、国家治理基本领域	(133)
(一) 互联网思维和国家治理	(133)
(二) 网络安全、网络信息保护和隐私权	(135)
三、新趋势、新动态:新媒体与社会结构的互动	(138)
(一) 受众调查研究、受众研究范式	(140)
(二) 新媒体与社会生活、趣缘群体、粉丝社群	(142)
(三) 社会生活的新趋势、新动态	(146)
四、喜忧参半:新媒体使用对于新闻业的影响	(149)
(一) 网络新闻从业者、新闻生产、报道范式	(151)
(二) 融合新闻、媒体融合	(156)
五、治理与表达:国家(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157)
(一) 网络舆情、网络反腐、地方治理	(158)
(二) 公共参与、意见表达	(160)
(三) 网络社会动员、集体行动等	(161)
六、中介化、可视性、时空观等:理论视野的拓宽	(165)
(一) 媒介化、中介化、媒介权力	(165)
(二) 可视性、现代性、公共性	(167)
(三) 时空重构及其多元议题	(168)
七、结语	(170)

新闻理论研究发生结构性变化

——2014 年我国新闻理论研究

本章对我国多种新闻传播学 CSSCI 期刊中有关新闻理论研究话题和内容进行了定量描述与定性分析,总结了 2014 年新闻学理论研究的热点与特征。公民新闻、新闻专业主义、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新闻思想史、新闻制度、媒体融合下的新闻发展、舆论研究等是本年度研究的热点话题,而去年较热点的媒介素养、职业道德等主题逐渐边缘和淡化。总体而言,我国的新闻理论研究正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重心转向新媒体语境下的理论研究。

2014 年,中国新媒体的移动化和融合化程度不断加强,新闻传播机制仍然处于探寻变革的过程中,作为理论支持与指导的新闻学理论研究显得尤为重要。为了发现 2014 年我国新闻学理论研究的基本情况,我们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对具有代表性的新闻传播学 CSSCI 期刊进行了综合整理,以发现新闻理论研究的基本格局、主要话题及基本特征,并分析新闻理论研究的发展趋势,提出未来研究的建议。

本研究主要选取《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当代传播》《新闻与写作》《新闻记者》等期刊作为基本文献考察来源,搜集了这些期刊中 2014 年发表的有关新闻理论研究论文共 115 篇。根据新闻理论研究侧重点的不同,按照新闻基本概念、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新闻职业道德规范、新闻史、新闻思想史、公民参与的新闻传播、新闻理论研究现状和新闻专业主义等方向展开研究,以描述新闻理论研究的基本格局。

一、新闻理论建设研究

对新闻理论本体的研究依然是关注较少的研究对象,因此,很多批评家专门提出重视新闻理论研究的话题。杨保军论述道,“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国新闻理论研究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学术性的新闻理论研究仍然比较薄弱’,理论疲软现象依旧存在;在如今更加强调应用研究的氛围中,理论研究更是步履维艰”。其针对种种新闻理论弱化现象,分析了强化新闻理论理论性的根据与理由,并重点就如何增强或提升新闻理论的理论性提出了一些可行性的路径与方法。在其相关研究成果中阐述了新闻学科的独立性与新闻理论建设的关系以及新闻理论建设的必要性;指出了新闻理论理论性弱化的表现:①缺乏新闻理论意

识,缺少建构新闻理论的自觉;②缺少对学术研究、对理论研究的基本敬畏;③新闻理论研究中的“虚他主义”(作者自创新说法)倾向比较严重;④生硬迁移搬用其他学科理论多,认真消化转化成为自家理论少;⑤新闻理论教材缺乏足够的理论性。最后并提出强化理论性的途径与方法:①强化基础研究,改变新闻有应用、无理论的观念,逐步建构新闻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与内容;②展开积极的学术对话与理论交流;③从本科新闻理论教材的理论化建设着手^①。

也有从新闻学研究规范的角度切入的研究,如郑保卫、李刚存认为:“新闻学的学术规范研究,应置于学术规范讨论的语境中,勾勒其总体历程和研究进度,为今后深入学术规范研究及建设提供指导。”作者对中国新闻学的学术规范进行了系统的讨论和梳理,从学术规范的层次和定义入手,追溯了中国新闻学发展历程中的学术规范问题,并将其作为新闻学学科建设中的一个重要话题来看待,进而从几个方面强调了学术规范对新闻学发展的重要意义^②。

运用框架理论,从受众角度研究新闻理解问题,取得了重要进展,如杨浣认为:“新闻理解是受众掌握新闻事件主旨的一个认知过程。”他“阐释了新闻理解的两个关键部分:新闻记忆和新闻解读。它们虽在概念上截然不同,但在操作上时常混淆。三个实验用来检测新闻文本特点和个人基模对新闻理解的作用。结果显示,受众的教育程度而非新闻的显性特征在新闻记忆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两类新闻框架——通用框架和具体议题框架,作为新闻的隐性特征,和个人基模共同影响新闻解读,个人基模被视作主导因子。”^③

基于新媒体时代背景,也有从更基础层面,研究“新闻是什么”的问题,如杨保军“以新的媒介环境为参照,重新界定了作为价值客体的新闻范围,并说明了讨论“新闻的价值”的新根据与新理论。其研究立足“新闻的价值”研究主题与研究方向,从价值主体、价值客体、价值关系、价值分类等角度,分析阐释了关于“新闻的价值研究在当前应该进行的方法论调整与转换。”^④

陈力丹认为:“巨量新闻信息,不论是新闻的发布者还是接受者,都无暇追问‘本质非本质’、‘绝对相对’等等,但需要很实在的新闻理论来指导新闻的选择、观察的视角、梳理的规则、制作的方法。然而目前我国新闻理论,政治套话还是多了些,有的说得玄了些。看起来,民众似乎掌握了前所未有的新闻控制权,但这也意味着民众自身必须拥有把握这种控制的能力。否则,仍然会被强权操控,而且比以往更深度地被操控,因为传播技术的最大控制者永远是最高权力的拥有者。”^⑤

① 杨保军:关于提升新闻理论理论性的几点思考,《现代传播》,2014年第1期,第28~34页。

② 郑保卫、李刚存:学术规范讨论与中国新闻学,《新闻大学》,2014年第1期。

③ 杨浣:新闻文本、新闻框架和个人基模对新闻理解之影响——以“锋芝婚变”为例,《新闻大学》,2014年第2期,第10~17页。

④ 杨保军:准确认识“新闻的价值”——方法论视野中的几点新思考,《国际新闻界》,2014年第9期,第108~121页。

⑤ 陈力丹:树立全民“新闻素养”理念,《新闻记者》,2014年第4期,第61~63页。

虽然“新闻”已经成为研究者视野中司空见惯的术语名词,但对新闻基本理论的研究依然存在,如杨保军认为:“在‘后新闻业时代’开启的大背景下,我国职业新闻传播观念已经和正在发生着宏观演变甚或转向,就目前来看,集中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新闻主体观念:由偏向‘传播主体中心观’,转向‘共同主体中心观’;传播价值观念:由偏向‘宣传引导中心观’,转向‘服务公众中心观’;内容与方式观念:由偏向‘内容中心观’,转向‘技术偏向中心观’;新闻传媒属性观念:由偏向‘意识形态属性中心观’,转向‘多元属性统一观’。”^①

“公众”与“新闻”的关系也作为新闻理论研究范畴予以关注,如杨晓凌认为:“公众与新闻界之间的关系在新的世纪里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他援引美国著名新闻学刊物《哥伦比亚新闻学评论》的提问:“何为新闻之鹄的?接受调查者有老牌报人,也有新媒体新贵;有资深职业新闻人,也有博客记者自由写手;有著名节目主持人,也有即将入读新闻学院的大学新生;有获过奥斯卡奖的制片人,也有总统御前写手……每一个寥寥数语的答案都关联着最新的新闻现象,各种个性化的表达使得一个枯燥的理论问题变得妙趣横生。”他“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回答进行重点译评,与之类似或者相关度较高的观点,则予以整合综述。”^②

杰·布鲁默、斯蒂芬·库森认为:“过去几十年,新闻学作为一个领域凭借己力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这既值得庆祝,也值得反思。尤其是如今的学者们对新闻机构的内部运作投入了持续的注意力,却忽略了它们外部的联系、影响和意义,这其中就包括它们的规范性等方面。实际上,重要的规范性研究已经呈现在文献中,”他们“将对其中的六种予以界定和例证。”“但目前为止,这些理念对新闻记者的想法或实践影响力还相对薄弱。”他们“归纳并建议了一条连通新闻学者和实践者之间的道路,使得他们能开展更密切和更富有建设性的对话,并聚焦于双方都面对的规范性挑战。”^③

张涛甫认为:“理论是对实践经验的抽象,它从实践中来,再到实践中去。一个理论若不能回应实践中的一些重大问题,理论的合法性就会踩空。中国新闻传播理论的‘结构性贫困’,首先表现为:理论研究对生生不息的新闻传播实践缺乏有力的回应,尤其是对实践中的重大问题鲜有正面、有力的回应。当下中国遭遇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种变化是全方位的,而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变化更为深广。中国社会转型正好遇到以新互联网、移动通信为代表的新传播革命。这双重变革叠加在一起,释放出天量级的能量,对当下中国构成革命性的影响。传播系统作为连接社会系统各个器官的传感系统,其功能不是局限于局部,而在全局。”^④

① 杨保军:我国职业新闻传播观念的几个宏观转向——以“后新闻业时代”开启为背景,《新闻记者》,2014年第5期,第3~9页。

② 杨晓凌:新闻业:正在消失的边界——《哥伦比亚新闻学评论》新闻理念调查专题译评,《新闻记者》,2014年第5期,第18~28页。

③ 杰·布鲁默(Jay G Blumler)、斯蒂芬·库森(Stephen Cushion)著,郭恩强编译:新闻学研究的规范性视角:回顾与展望,《新闻记者》,2014年第7期,第86~92页。

④ 张涛甫:新闻传播理论的结构性贫困,《新闻记者》,2014年第9期,第48~53页。

姜华从新闻自由角度对新闻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称“自弥尔顿等人为出版自由争辩之后的两三个世纪,新闻出版自由成为欧美诸多一流思想家关注的重要课题。事实上,近代以来,欧美思想界关于新闻自由的理念多有争论,而争论的起因在于——从思想史上看,新闻自由至少有功利主义、社会契约论、折衷派三个不同源流。起源不同,理解当然有异,这是后世新闻自由论争不断的原因所在。”^①

陈力丹、廖金英在《2013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十个新鲜话题》中“概述了2013年我国新闻传播学界研究中的十个新鲜话题。这一年,我国新闻传播学界研究的新鲜话题与往年稍有不同,关于新传播技术的话题具有明显的强势,以大数据、社交媒体为核心的研究圈层逐渐成形,一定程度限定了其他离散话题的讨论语境,原本呈板块分布的研究领域都变成了其子话题。研究者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里,都必须对大数据和社交媒体的环境做出回应。”^②

孟威、姚金楠在《2013年网络新媒体研究热点透析》中指出,“2013年是新媒体行业继续飞速发展的一年,新技术层出,新的传播现象日益丰富。”该文“聚焦于这年度网络新媒体研究者最为关注的五个领域:微博微信、网络舆论、手机新媒体、媒介融合和社会影响,梳理了本年度学科研究的基本情况和整体脉络并加以评析。”文中认为,2013年网络新媒体的研究呈现出以下三大特点:一是结合技术热点和国家政策等新媒体发展中的现实问题进行学理上的深化,研究有的放矢;二是随着新媒体产业发展的升级和学术积累,研究中有了明显的发展视角和历史维度,比较研究被更多地引入,行业发展和学科研究的脉络逐渐清晰;三是研究中学科交叉的趋势愈加明显,研究者思考维度不断丰富,拓展了新媒体研究的角度和范围。但也有诸多不足,如在针对新技术、新现象的研究中存在大量同质化、介绍性、总结性的阐释,短时间内产生了很多应景之作,缺乏深刻思辨;一些研究中片面崇尚数据测量和量化分析,缺乏理论深度。这些问题为未来新媒体的研究留下了拓展空间,在今后的科研中有待进一步完善。

刘建明在《当代西方新闻理论的完型》中提出,“当代西方新闻学是否已经衰落?传播学原理是否代替了新闻理论?”并在文中“探讨了西方新闻理论发展脉络、当代西方新闻理论的主要成果以及新世纪西方新闻理论的创新。当代西方新闻理论的形成同当代政治、经济、科技和社会改革具有相互依存的关系。”^③

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一直是我国新闻理论界的重要课题。新媒体、自媒体的飞速发展使得舆论环境格外复杂。因此,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及其中国化问题更加重要。

① 姜华:试论现代新闻自由观念的三个起源,《新闻记者》,2014年第12期,第70~75页。

② 陈力丹、廖金英:2013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十个新鲜话题,《当代传播》2014年第1期,第4~8页。

③ 刘建明:当代西方新闻理论的完型,《当代传播》2014年第5期,第4~6页。

丁柏铨在《当今中国的舆论引导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指出,“当今时代,中国社会舆论及其格局相当复杂,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面对这种形势,官方及传媒机构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才能掌握舆论引导主动权,并有效引导社会舆论。在此前提下,官方及传媒机构还应努力探索新的传播方式,以适应新的社会舆论格局。”^①

童兵在《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和推进新闻改革》中指出:“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各行各业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关于新闻传媒业,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健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体制机制。健全基础管理、内容管理、行业管理以及网络违法犯罪防范和打击等工作联动机制,健全网络突发事件处置机制、形成正面引导和依法管理相结合的网络舆论工作格。”^②他认为,同一切科学理论一样,蓬勃发展的中国新闻传媒和日益深化的中国新闻改革,也将以不断丰硕的时间经营和理论积累推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发展、深化和创新。我们的使命和责任,就是大胆地实践,努力地总结,把传统媒体同新兴媒体融合共进的新理念、新做法、新体会提升到理论的层面,对舆论表达与舆论引导的转型新格局的打造自觉地给以理论上的阐释,对中国经验与外国做法的交融给予学理上的解读,不断地推进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童兵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形成的时代条件和在今天的发展》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核心是它的理念部分,即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新闻观包括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和其他经典作家关于人类新闻传播现象,新闻传媒生产、流通、消费行为,无产阶级政党同实际工作、同人民群众、同大众传媒关系的主要观点。所谓理论和科学,是人们由实践概括出来的关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知识体系。新闻学的学术源泉来自新闻传播活动和新闻传媒产业。新闻教育推动了这种学术的转化和普及,新闻研究则加速加深了这种转化并使其不断趋于完善,使之上升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一百余年来,新闻学走过了一条从术到学渐次建构的路程。”^③该文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创立的时代条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创立和列宁的发展,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发展以及改革开放中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发展,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发展过程进行了描述。

陈建云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中,认为以“四性一统”为核心的中共党报理论体系,以“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为核心的“舆论观”,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最具理论价值的创新成果。在网络传播新时代,我们党提出主流媒体与新兴媒体并举、形成舆论引导新格局,掌握新闻宣传工作主动权、增强舆论引导针对性和实效性,融通“两个舆论场”等命题,显示了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勇气与智慧。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大众化主要体现在对“三贴近”、“走转改”、“以人为本”等新闻宣传工作原则、方法、作风的强调与贯彻。

① 丁柏铨:《当今中国的舆论引导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当代传播》2014年第6期,第11~14页。

② 童兵:《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和推进新闻改革》,《当代传播》2014年第1期第1页。

③ 童兵:《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形成的时代条件和在今天的发展》,《当代传播》2014年第1期,第37~40页。

三、新闻工作者职业素养与使命研究

新媒体时代,新闻工作者面临着更加复杂的社会环境与媒介生态,所以对职业素养和使命感的要求更加突出。这方面的研究也更加迫切。

张昆在《媒介化时代传媒工作者的综合素养》中指出,“在传媒工作者的培养过程中,不论是在学校,还是媒体业务岗位上,教育或继续教育的着力点不能仅限于专业技能,专业技能之外的人格塑造,责任意识、协作精神、人文情怀的提升,学习能力、全球视野的拓展,批判思维的强化,都是应该重点注意与强化的内容。只有全面关注,平衡发展,传媒从业者才能经由学习和实践过程,最终具备融合传媒实践所需的综合素质,进而在更高层面上满足社会的期待。”^①作者认为,媒介化时代传媒工作者的综合素养包括健全人格、人文情怀、责任意识、协作精神、学习能力、批判思维、全球视野、专业技能。

程曼丽在《社会化媒体时代职业记者的使命》中指出:“社会化媒体时代的媒介文本(或类媒介文本)大体有两种,一种是由专业性的传媒机构生产出的文本;另一种是由以微博为代表的自媒体平台生产的文本。前者可称为‘完成文本’,后者可称为‘未完成文本’。社会化媒体时代,事实链条不完整、不清晰,或仅涉及问题表象的‘未完成文本’易使人们的心理和认知过程产生偏差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将‘未完成文本’转换为‘完成文本’就成为当今时代的重要命题。”^②她认为,从认识论、方法论层面以及操作(写作)层面来完成文本。在社会化媒体时代,职业记者不能盲目地受微博牵引,一味爆冷门、拼隐私、晒问题,以离奇诡异的故事和细节渲染吸引受众眼球,这不应当是职业记者所谓。职业记者的责任是在社会化媒体提出问题的基础上,进行事实的确证与深度开掘,展示事物之间的联系与本质,提供解决问题的思路与方法,引导受众透过现象看本质,进而达到理性的认识。

刘琴在《新闻职业道德与网络民粹主义的博弈——以“李某某强奸案”的传播为例》中“以‘李某某强奸案’为例,选择四家门户网站的信息传播,深入解析网络如何在‘民粹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对未成年人的身份信息进行毫不避讳的传播,甚至刻意对其身份进行加工,以及专业媒体又如何在‘网络民粹主义’的裹挟下无视《未成年人保护法》,违背《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的基本原则所进行的报道。在网络民粹主义大行其道、视听被混淆的当下,进一步重申坚守新闻职业道德。”^③她认为,在网络民粹主义时泛滥时媒体需要警惕民粹主义的负面效应,少数意见终揭开民粹主义的迷雾,媒体始终要忠于真理,坚守职业道德。总之,网络民粹主义泛滥时尤需坚守新闻职业道德。

孙晓红、陈娜在《记者权益侵害的现状 & 保护策略》中指出:“近年来,新闻记者在实施与

① 张昆:媒介化时代传媒工作者的综合素养,《当代传播》2014年第1期,第91~93页。

② 程曼丽:社会化媒体时代职业记者的使命:完成文本,《当代传播》2014年第1期,第12~13页。

③ 刘琴:新闻职业道德与网络民粹主义的博弈——以“李某某强奸案”的传播为例,《当代传播》2014年第4期第53~55页。

论监督、维护他人合法权益、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做出了不少贡献,但在这个过程中记者的多项权益却屡屡受到侵害。”该文“论述了记者权益受侵害的三种方式:暴力式侵权、软暴力式侵权以及公权私用式侵权,并归纳出侵权方式的特点。基于此,本文从法律层面出发,结合其他方面提出了保护记者权益的对策。”^①

牛月在《新闻记者的法律保护和自我保护》中,“全面梳理了新闻记者保护思路和工作方法,重新提出法律保护和自我保护两分法的学术观点,从六个方面阐述新闻记者法律保护的治理思路,同时从七个方面探讨新闻记者自我保护的工作方法。在当前形势下,这些思路和方法值得参考。”^②她提出,法律保护和自我保护两者结合,才能更好地维护记者的权益。

张志安、张京京、林功成在《新媒体环境下中国新闻从业者调查》中,“基于对全国5家报业集团(报社)2109个有效样本的问卷调查,试图全面呈现新媒体环境下中国新闻从业者的职业生态。调查发现,中国新闻从业者男女比例基本持平,平均年龄32岁,平均工作年资为8.4年;绝大部分人拥有大专或大专以上的学历;九成以上月收入低于1万元;主要使用互联网获取线索和查找背景,其次是与受众互动与推广报道;他们认为媒介最重要的功能是提供信息,其次是服务与娱乐。此外,他们对自我新闻伦理观的评价较高,对工作自主性的评价则一般。”^③

韩亚辉、沈雨菲在《试析新闻线索网络化——由“传受分离”向“传受合一”的新模式转变》中认为:“随着博客、微博、微信等新式社交工具的兴起,草根的言论逐渐成为引导舆论的重要部分,同时,新闻线索的来源趋向网络化,新的媒介传受模式开始呈现在大众面前,新闻工作者搜寻新闻线索由‘传受分离’的传统模式向‘传受合一’的新模式转变,在被动与主动的转换之间找到一个突破点和平衡点,是新媒体时代记者的职责与任务。”^④

四、新闻伦理研究

也有从“公民”参与新闻传播角度研究新闻理论的,如张垒“研究探讨当‘公民记者’或‘自媒体’所具有的朴素伦理标准进入新闻传播流程时,对传统新闻伦理可能带来的影响。研究追溯了新近发生的若干热点事件产生、演化的传播链条,分析了‘公民记者’、传统主流媒体、市场化媒体以及资本化网站在其中的角色及相互作用。该研究发现,传统主流媒体对热会热点问题的回避与忽视、都市类媒体和网站片面市场化取向,都使新闻伦理面临解体的窘境,“公民记者”的加入事实上加剧了这种解体的趋向,并使之变得更加破碎和混乱。他认为:‘公民记者’与网络媒体、都市报之间的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人民感知社会热点事件所依

① 孙晓红、陈娜:记者权益侵害的现状 & 保护策略,《当代传播》,2014年第4期,第101~110页。

② 牛月:新闻记者的法律保护和自我保护,《当代传播》2014年第2期,第101~102页。

③ 张志安、张京京、林功成:新媒体环境下中国新闻从业者调查,《当代传播》2014年第3期,第4~8页。

④ 韩亚辉、沈雨菲:试析新闻线索网络化——由“传受分离”向“传受合一”的新模式转变,《新闻大学》,2014年第2期,第12~17页。

据的‘拟态环境’。‘公民记者’所具有的某种‘道德义愤’事实上参与了新的热点事件的生成和传播,并在此过程中进一步扭曲了事实。在一片真假难辨中,‘公民记者’所追求的并不是‘真相’,而是自己的‘成见’,以及对于事实真相的‘想象’和‘重构’。”^①

唐佳梅从“他者报道”指出新闻伦理问题,她认为:“新闻全球化传播带来他者报道的诸多问题,传统国际新闻研究主要从内容分析与新闻生产的路径切入,”她“从新闻伦理角度进行分析,对跨国跨文化之他者报道中伦理问题的产生、类型、实质及建构进行理论层面的思考,从批判的和跨文化的视角探讨全球新闻伦理的重构,并试图通过创新波特方格伦理模式探索新闻伦理推理在记者实践中的可操作模式。”^②

纪莉、黄豫通过四个部分论述了全球新闻伦理能否成立,以及如何建构的争论。第一部分从现状出发,提出是否有必要、有可能建构全球新闻伦理这一问题。第二部分则通过说明伦理的概念、分类以及现今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新闻伦理的发展过程,对新闻伦理进行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第三部分则是按照不同的分类,分别对全球新闻伦理的不同观点进行讨论。最后一部分总结提出如果建构全球新闻伦理是必要的,那么其建构必须是既寻求共同道德又尊重多样性不断发展的过程。^③

严三九、刘峰认为:“传媒伦理是关系到传媒业健康发展的关键领域,传媒伦理建设多年来也一直是业界的重点工作。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新媒体已经成为人类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随之也为传媒伦理建设带来了新的挑战。目前,发生于新媒体平台上的传媒伦理失范现象呈现出与传统媒体时代不同的诸多特点,深入分析其成因,并且探索有效的对策便成为传媒工作者面临的迫切任务。”^④

李晶、郝雨认为:“现代信息社会中的新闻报道,其对象是客体事实,其成品是主体事实。它不仅引领舆论导向,也调控伦理底线。‘把关人’需要对社会信息把关,也需要为自我的新闻写作把关,目的是将浅层次的‘应该’,向符合受众利益最大化的深层次‘应该’转化。这就需要具有力排众声喧哗的勇气和坚持正义的伦理担当。”^⑤

杨保军认为:“新兴媒介与其他社会因素共同作用,开启了一个新的新闻业时代——后新闻业时代,新的媒介环境基本生成新的传播主体结构已成事实;与此相应,对新闻与新闻传播具有生命意义的新闻真实领域产生了诸多的新问题。其中最为典型的表现是:‘有机真实’进入新的有机方式;‘前瞻真实’成为新的真实类型;‘整体真实’获得新的实现可能;‘真实确证’面临新的方法困境。”^⑥

也有人从网络时代,指出新闻报道对个人隐私权的侵犯,因此需要完善个人信息保护法。郑文明指出:“计算机与信息技术的发展使‘遗忘变成了例外,而记忆却成了常态’,由此

① 张垒:破碎与疏离:从热点事件传播看“公民记者”对新闻伦理的影响,《现代传播》,2014年第4期,第50~54页。

② 唐佳梅:他者报道的伦理问题与解决路径,《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年第11期,第60~69页。

③ 纪莉、黄豫:论国际传播中的全球新闻伦理的建构:思路与挑战,《新闻大学》,2014年第5期,第1~7页。

④ 严三九、刘峰:试论新媒体时代的传媒伦理失范现象、原因和对策,《新闻记者》,2014年第3期,第25~29页。

⑤ 李晶、郝雨:受众利益最大化与恪守新闻伦理,《新闻记者》,2014年第3期,第30~33页。

⑥ 杨保军:新媒介环境下新闻真实论视野中的几个新问题,《新闻记者》,2014年第10期,第33~41页。

导致了‘数字遗忘权’的产生,数字遗忘权是数据主体享有的要求数据控制者删除关涉自己的个人信息,以防止其进一步传播的权利,‘数字遗忘权’的提出对于完善中国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有着重要意义。”^①

范以锦在《社会环境与新闻道德坚守》中指出,“新闻职业道德问题”会涉及诸多客观原因,这与“媒体在向市场化和全媒体转型中形成的压力有关”,如“同行竞争、与新媒体竞争、公关机构的诱惑、绩效考核、生活压力等。”他认为:“确存在这些内部和外部社会环境的影响,问题在于,社会环境是否就可以成为不坚守新闻道德的理由?毫无疑问,新闻职业道德问题是会受到社会环境影响的,但不同时期的社会生态尤其是政治生态,对新闻职业道德的影响是有差异的。在社会政治生态极为不正常的年代,新闻道德的失守几乎都源自于这种恶劣生态;而在社会政治生态比较正常的年代,虽然依然有不良社会环境,但这不应成为新闻人道德失守的理由或借口。”^②文中指出,当今的新闻道德问题,尽管依然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但恪守良好的道德操守是主观努力可以做到的,也是做新闻人起码的要求。我们可以看到绝大多数媒体人对败坏媒体形象的行为,尤其是新闻敲诈这样的违法犯罪行为,是深恶痛绝的。而且,许多媒体人生活艰辛,却非常敬业。良好的队伍,是我们坚守良好职业道德的最为重要的组织基础。文章提出恶劣的媒介生态环境绝不能成为新闻道德失守的理由,媒体人应以积极的态度,在净化社会环境中承担义不容辞的责任。作者认为,在新技术主导与市场化程度愈演愈烈的媒介环境中,我国的媒体行业面临着更加严峻的生存压力,因此在这一阶段重申新闻职业道德与操守问题是大为必要的,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伦理坚守是成为合格的新闻人,写出负责报道的首要要求,因此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不会随着媒介环境的变化而减弱,而是更为重要。

在范以锦的另一篇文章《道德缺失会滑向法律的陷阱——浅谈新闻敲诈》中,他对新闻伦理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发掘,指出“有偿新闻,有偿不闻属于新闻职业道德问题,但是量变会发生质变,而且有些边界比较模糊,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被判定新闻敲诈,从道德问题滑向法律的陷阱。因此,在新的形势下,对新闻人道德操守的约束变得越来越重要。”^③新闻敲诈是有偿新闻和有偿不闻的升级,是从量变到质变的必然结果。三者并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在界限比较模糊的状态下,往这边靠可能是道德问题,往那边靠可能就是违法犯罪的问题。然而,作为肩负神圣使命的媒体人,经营困境等环境的变化不应成为放弃新闻理想、抛弃道德底线的理由。作为媒体人,不应与社会上的不良现象同流合污,而应激浊扬清,弘扬社会正气。

五、媒介融合新闻研究

2014年是媒介融合的高峰期,所以,这一年的新闻理论研究,也有较多对于相关问题和

① 郑文明:互联网时代的“数字遗忘权”,《新闻界》,2014年第3期,第55~59页。

② 范以锦:社会环境与新闻道德坚守,《传媒》,2014年第1期,第56~57页。

③ 范以锦:道德缺失会滑向法律的陷阱——浅谈新闻敲诈,《传媒》2014年第19期,第19~20页。